

痔疮肛瘻

哈铁卫校附属医院肛肠治疗中心,引进新一代高科技 LC-100A 型电脑控制痔疮、肛瘻治疗仪,彻底根除痔疮肛瘻,每枚痔疮只需几秒钟就可脱落,不开刀,不出血,无痛苦,不住院,随治随走。治疗费优惠 30%。医院地址:哈市西大直街 23 号 乘 11、64、107、10、78、86 路省博馆中心下车。电话:0451-53626174



4月11日-4月17日(第1315期)

本版编辑 贾成钢

电话:82810605



广播电视报

社会长镜头

本报特别专访



李琳在天安门前

样的经历,在超市购物的时候,经常会看到有中国人站在那儿大声说话,看那架式就像是吵架一样。仔细分辨,很可能是两口子在为选择哪种品牌而热烈地争论。在西方,一个有教养的人是绝不会在公共场合如此大声说话的,而在许多中国人眼中,公共场所是他们无限“延伸”的家,在这里当然可以不顾忌他人的感受。在一些座位比较多的饭店也一样,人多时大家一起信口开河,外国人一旦置身其中,会感到头晕像要“炸开”一样恐怖。

李琳给本报记者讲述了她在北京公共汽车上看到的一次真正的吵架。“那好像是一个女乘客与汽车司机吵架,汽车还在行进的过程中,在一车人的眼皮底下,他们一直在争吵,互相用最恶毒的语言,我被后终于听明白了好像是因两元钱,司机怀疑那

如果没有写出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这本书,来自瑞典的凯瑟琳·李琳会和所有到中国的外国朋友一样,不会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。可是随着这本深入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书籍问世,她一下子在中国成了“名人”。上周,本报记者找到了正在上海家中的她,并听她深入剖析了中外人性的共性和差异。

1991年毕业于瑞典某大学国际政治系的凯瑟琳·李琳,最初的职业是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。很快,天生喜爱挑战和探究陌生事物的她迷恋上了中国文化,并开始学习汉语。2000年初,凯瑟琳·李琳来到中国,刚开始在中国语言大学(原北京语言大学)留学,因为那里的“外国人太多”,没有很好的语言环境,她又转到北京师范大学,李琳这个名字就是她到北师大后中国朋友给起的。通过长期的学习和观察,李琳发现了中国人与外国人

的时候,有件事让我和丈夫觉得无法理解,这就是中国饭店点菜的方式。你刚一坐下,服务员就会笑嘻嘻地手拿菜单递过来,然后站在你身旁,好像你在大约四秒钟的时间内就能看完整个菜单,然后就可以开始点菜了似的。要是在瑞典的话,你可以花费好长时间来看菜单,然后从中选出自己喜欢的菜。在你做出选择之前,没有人会用站在你身边的方式催促你,可是在中国,我发现要是你在点菜时花费太长时间的话,服务员会用一种很奇怪的眼光看你。同样的不快也包括在商场里,你站在商品前,马上会有服务人员出现在你的面前。你本打算随便看看,可是总有一位售货员亦步亦趋地跟在你后面,并不时地向你推荐。虽然她的目的可能是想帮助你,但这让我们西方人感到很奇怪,完全破坏了轻松的购物心情,反而承受着无形的压力。通常遇到这种

院看病时,眼前令她震惊万分。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偌大的房间,一张张床上躺着病人。那些病人不分男女,有的裸露着大腿,有的裸露着肩,在他们裸露的部位扎满了针。这时,突然有个病人大声问我:“你哪儿不舒服了?”听到这个声音我顿时感到天塌地陷,在西方,一个陌生人是不能向一位病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的,更不可能用那么大的声音,似乎要向全世界宣告。有关身体方面的问题在我们看来是绝对的个人隐私,如此敏感的问题是根本不能被随便提及的。轮到我看病了,老中医让我躺到一张床上,因为我特别注意干净,我告诉老中

中国人怎么总让外国人“无法理解”

之间的许多深层次差异。

受不了中国人的过分“热情”毛病出在哪儿?

李琳向本报记者分析说:几乎所有来中国的西方人,首先都会感到来自周围环境的

外国“明白人”试解中国之谜



李琳与中国邻居合影

“压迫感”。中国人口众多,是一个“群居”社会,没有讲究个人隐私的传统,最大的特点是“不见外”。“这会让我们外国人既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,又常常‘不堪重负’。到了中国,我发现交朋友成了一件易如反掌的事,其实无论哪个地方的人,都有被呵护、被关心的需要,所以当我来中国上大学后,受到中国同学和老师的热情欢迎和帮助,我很感动,这让我感到从没有过的温暖。

李琳接着说:“可是热情过了头,就让人不好接受了。我曾经听人说,好多中国人都喜欢一进酒店或商场,一眨眼的工夫会有好多人前来为你服务,否则就会觉得受到冷落,会很生气,以为对方瞧不起自己。我觉得这有些太夸张了,这样的场面外国人想起来挺滑稽的。比如刚从瑞典到中

情况,我们的选择就是用最快的速度离开。”

这背后是什么样的文化差异在起作用呢?李琳在经过与许多中国文化学者探讨后得出结论:一贯不注重个人隐私的整个社会氛围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最大原因,人们习惯了不给对方选择和思考的权利,不给别人做出个人判断的空间。比如在中国的商店,售货员推荐的方式和理由是:大家都觉得这东西好,你难道例外吗?而外国的思维是:这东西是否适合我,我是否真需要,别人对此的态度没有任何参照意义。

在中国看病,场面让西方人震惊

在西方,去医院看病是一件非常私密的行为。在医院里你只接触一个人,那就是医生。一般是由医生将病人叫到自己的诊室,然后把诊室的房门关上,医生面对你一个人开始问诊。此时在他的诊室里是不允许第三者进入的,甚至连护士也是不被允许的。

李琳向本报记者讲起了她第一次在北京一家中

医用我自己带来的一次性用针。老医生很不高兴,嘴里嘟囔了几句,就开始给我用了一个比较厉害的方法扎。白始至终几乎没有问过我治疗后的感觉,当我迫不得已主动向他询问我的病情谈如何治疗时,他竟露出一副不耐烦的神情。

“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中国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。在中国,医务工作者认为如果你不是一个学过医学的人,对你解释治疗方案,无疑是对牛弹琴。所以他绝不会详细地告诉你怎么做,与此相反,我们西方医务人员的观念是一定要吧患者的病情讲清楚。他给你解释的时候,你随时可以说你没听懂,他会马上再给你解释。他也会详细告诉你各种治疗方法的利弊,吃的药有没有副作用等。患者永远有选择同意哪种治疗方案或不同意哪种治疗方案的权力。而在中国,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西方社会服务追求的是个人权益最大化

很多中国人都有这样的经历,到火车站坐火车,为了到达自己那列火车,会在火车站里走好长时间,有时候

时间来不及,进了检票口后必须得跑起来。一个健康人都必须这样,试想如果坐火车的是一个残疾人,他该面临多么巨大的困难。不单是火车站,许多公共设施都缺乏人性化设计和关怀。而西方与我们正好相反。李琳说:“我也注意到这个问题,我们国家所有的公共设施,都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需要,我们的逻辑是,假设这个设施的使用者是一个身体极度不便的残疾人,他都能应付自如,那么其他的人就更没有问题了。也许在现实中这个设施没有一个残疾人使用,我们也要把他们出现的可能性考虑进去。这种思维从小就灌输到我们每个人的头脑中,所以无论我们谁,只要肩负的工作是为社会大众服务,就会这样做,而我遗憾地看到,中国在这方面还差得很远,有许多时间出现的情况正相反:社会公共设施是强势群体垄断和专有的,只有一部分人能够享受到社会生活的快捷和便利,而另一部分相对弱势的群体只能望洋兴叹。”

中国人可以为两元钱吵架

李琳说:在中国的外国人都有这

位女乘客没有往投币箱里扔钱,而女乘客对这种怀疑感到受了侮辱。

“我也看到过在超市里男顾客与女服务员大声争吵,原因竟是他排到这个柜台要关闭了。这要是在外国人看来,是很正常的一件事,可是那位中国男顾客却无法忍受。他要求必须在这个柜台结账,在被拒绝后很生气,如果在刚来中国的时候我不会理解,现在我终于明白了,他的愤怒是有原因的,他不仅仅是柜台关闭这件小事那样简单。也许是他的人生有太多的不如意,一次次与好的机会失之交臂,缺少住房,没有搞干,工资总是很低,孩子上不了好的学校,不如意的事情太多,柜台偏偏在他排到时就关闭了,他会在下意识中联想自己的人生,那些他无力改变的窘境已经令他心烦意乱了,所以才会这样的小事上发泄不满,释放情绪。”

李琳最后说,在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《金发碧眼看中国》这本书中,她试图从文化上深入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差异。做这样的探讨绝不是厚此薄彼,不是给谁挑毛病,而是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,让中国人看到自己身上的问题(当然也有优点),让外国人对中国人更加了解。

李琳目前在上海一家瑞典公司工作,她得到老板的特许,在家“带薪留职”,专心写一本向瑞典人推荐中国的书。 本报记者 贾成钢